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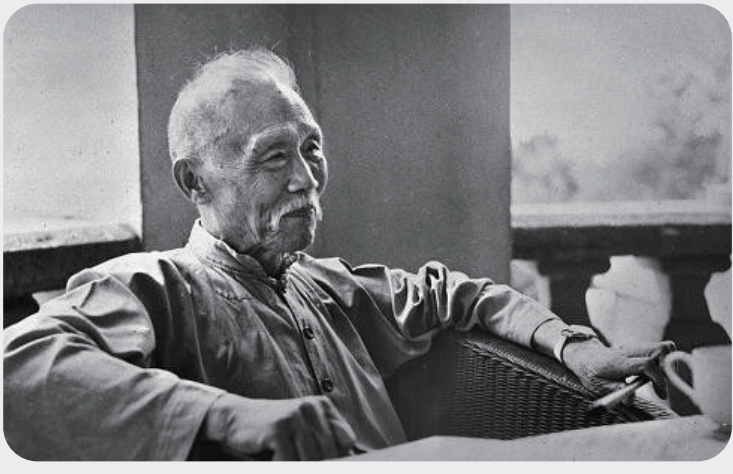
徐特立的『学习经』

□王倩

徐特立生于农家，家境清贫，父亲在他9岁时变卖了家中物件勉强地凑了一些钱送其上了村里的蒙馆。15岁时，他因伯祖母去世，经济压力骤增，只能辍学。“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道理，越发坚定了徐特立的求学之心。无论以后生活多么艰难，都未曾磨灭他热爱学习的信念。

那时乡下人读书少，徐特立学习经史子集遇到疑难，只能靠自己查阅资料，冥思苦想，以求得解答，在自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时所遇到的困难都被克服了。在学习上，徐特立主张学习要持之以恒，不要眼高手低而一味寻求捷径，尽想一步登天。他尊师重道，虚心求教，曾经步行40公里到长沙城向陈云峰先生请教，得到悉心指点后，他从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于是，徐特立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读书。

平日除留给家中20串钱的家庭开销外，徐特立把伯祖母留下的田产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最初教书时一年的工资也就3串钱，徐特立能用5年的教书钱去买一本定价为15串钱的《十三经注疏》，还有其他价格昂贵的大部头书也不惜血本地买了回来。徐特立读书十分刻苦，白天教书，直到晚上八九点以后才有时间自己读书。他把书中的定义、公式、表格、术语都写在本小子上，放在衣服口袋里，平时



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读。正是由于多年孜孜不倦，博学笃志，这才有了后来被尊称为“一代宗师”的徐特立。

秘密便在于挤时间学习，从当下开始学习，终身学习。

注重方法，踏实学习

徐特立强调，学习并非“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而是“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由死变活，关键是掌握方法，把科学方法和创造精神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并作为最终的归宿。学习首先要注意消化吸收问题，只有消化和吸收了所学知识，运用起来才能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如果不消化的话，即使胸藏万卷书，也是用不上的。

徐特立认为学习需要“定量”和“有恒”，只有日积月累才能有所成。他曾苦读过《说文解字》，该书共有9000多个字，是用繁体字撰写的，十分难以阅读和记忆。为了攻破这一难题，他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每天只定量学习两个字，睡觉时默默回忆白天学过的字，直到彻底掌握了再学下一个字。他说：“读书最忌讳走马观花、狼吞虎咽、囫圇吞枣。”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记忆，最后也只能是随读随忘。

读书要手脑并用，劳力与劳心并用。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时候，发现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有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不良风气。他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精为主的经验，反复琢磨，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主张。徐特立在读书时养成了边读边画要点和精彩处的习惯，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慢中有快，要懂得盈科后进，这样才能踏实进步。避免因贪多而找不到中心，虽劳心劳力而无成就的情况。他勤奋好学，注重学习方法的运用，善抓要领，成为党内学习的典范。

紧抓时间，终身学习

时间不足对徐特立而言又是另一个难题。白天有教学的任务，没有专门的时间用来读书，要读书就得挤时间。徐特立对《三国志·王肃传》中的“三余”读书法非常推崇。他在当老师期间，每天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开始读书，还充分利用了走路和天亮前的这段时间，一天总计的读书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徐特立没有浪费过一分乃至一秒的学习时间，力求循序渐进。

徐特立始终坚信学无止境，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徐特立51岁时受党组织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已过五旬的他学习特别有劲头。他说：“我纵然六十岁就入棺材，也可以干上八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但仍然手不释卷，还雄心勃勃地制订了一个“二十年学习计划”和工作计划。虽然他年纪已大，但每一天都甚是忙碌，从开会、工作到讲课、写文章，还要读书学习，忙个不停。徐特立坚持认为学无止境，活一天就得学一天，过去懂得的许多东西，总是会过时的。所以，要进行新的斗争，就需要新的知识，而要获取新知识就要永不间断的学习。

毛泽东称赞徐特立“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这是因为徐特立笃学不倦，不自以为知，不自以为能。他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依然要挤时间学习，并从学习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虽然终日忙碌，徐特立却依然能博览群书，其



贺龙：一心跟党走

□朱磊 王丹

青花斗彩带盖托茶杯、牡丹凤鸟蒜头瓶、青花瓷笔洗……在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有这么一批精美的文物，常常引得观众驻足观看。

文物曾经的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1927年7月，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抵达南昌后，将指挥部设在当时的宏道中学。贺龙是军长，随身惯用的一些茶具、笔洗等生活物件中，不乏珍品。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抵达南昌的第二天，来到贺龙指挥部，将起义的计划全盘告知。这是周贺的第一次会面，起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机密。面对党的信任，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当即以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南昌起义后，撤离南昌之前，贺龙将随身携带的珍贵用品赠予宏道中学校长刘屏庚，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感谢；另一方面，经过南昌起义的洗礼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的熏陶，贺龙决心改变过往锦衣玉食的旧生活，与士兵同甘共苦，共同开辟中国革命新天地。

1957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刘屏庚将这些物品捐给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在纪念馆内，还有一件珍贵文物与贺龙密切相关。这是一份党员登记表，它的登记对象就是贺龙。

贺龙为农民出身，姐姐也是共产党员，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广为流传。参加革命后，贺龙很早便萌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行至瑞金的时候，在瑞金锦江中学，周逸群、谭平山为介绍人，周恩来作见证，贺龙入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完成了由一个旧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这张承载着贺龙坚定革命信念与迫切入党决心的党员登记

湖南省双峰县蔡和森纪念馆珍藏着一只黑色的旧皮箱，长56厘米，宽34.5厘米，高18厘米。皮箱正面装有一把自动锁扣，还有一个金属与皮带相接的连环提手。它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前驱和卓越领导者蔡畅的遗物，是她每次外出工作、调研时的常用之物。

1919年，为寻求改造旧中国的“良方”，蔡畅在即将远赴法国求学之时，购买了这只黑色皮箱。1919年12月25日，她提着这只皮箱和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一起登上轮船，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此后，这只皮箱一直陪伴着蔡畅，从上海到马赛、从巴黎到莫斯科、从武汉到上海、从瑞金到延安……它一路见证蔡畅为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付出的艰辛努力，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

在古老而美丽的法国小城蒙达尔纪，她提着这只黑色皮箱，住进了雷蒙特列街15号的古老宅子，走进了蒙达尼女子中学。她啃着黑面包、马铃薯，在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的影响启迪下，废寝忘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一起呐喊出时代的最强音——“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畅不仅是革命真理的刻苦探索者，而且是勇于斗争的无畏战士。轰轰烈烈的法兰西岁月锻造了这群中国年轻人的灵魂与理想，鲜血

陪伴蔡畅71年的黑色皮箱

□谭剑翔

成商人太太，从国民党鹰犬们的眼皮下安然撤退，顺利抵达上海。蔡畅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深入工人群众，发动和组织妇女开展秘密斗争。

1931年11月，蔡畅在地下交通人员的护送下，躲过国民党的明岗暗哨，取道香港、汕头转闽西。历尽艰险后的蔡畅提着皮箱终于到达瑞金，那一刻她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蔡畅拽把扶犁，带领广大妇女承担起了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征粮、扩军、运输粮食弹药、护理伤员等任务。蔡畅作为妇女部长，带领妇女们顶起了江西苏区的“半边天”，为促进妇女解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形成了我党妇女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1934年10月，这只皮箱再一次装上党的文件，随着蔡畅踏上漫漫长征路。空寂的荒野，呼啸的北风，每一寸前进的路程都让这颗红色的心更加赤诚。雪山、寒冷，阻止不住行

军脚步；铁索桥、大草地，难泯对光明的追求。长征途中，蔡畅不辞劳苦地做着宣传动员工作，鼓励红军将士奋勇前进。蔡畅唱着《马赛曲》，夜渡于都河，涉过湘江，飞渡乌江，二进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历时近13个月，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蔡畅是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完全部征程的妇女之一。

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妇女，1947年2月和1948年11月，蔡畅先后两次率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走出国门，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今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会议。此时陪伴蔡畅出行的还是这只皮箱。蔡畅以她的高贵、大气、优雅和睿智，赢得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的拥戴，被推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949年3月，蔡畅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北

京主持妇女工作，这只皮箱也一同被搬进了中南海庆云堂。蔡畅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期间，中国妇女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向前迈进，书写了辉煌的巾帼篇章。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因病逝世。这年3月17日，为纪念两人一起携手走过的岁月，蔡畅从卧室衣柜顶上取下这只皮箱，拿出了箱中老两口省吃俭用积攒数十年的—摞存款单，共29张，总计99851.09元。然后，她又凑了148.91元现金，两项合计10万元整，作为特别党费交给了党。蔡畅的秘书提出：“大姐，要不要给孩子们留下一点？”蔡畅回答道：“不，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我们应当把它交还给党和人民，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去劳动。”

从1919年蔡畅购买这只皮箱到1990年她逝世，这只皮箱已经陪伴了她71年。而这只破旧的皮箱也成为一代妇女领袖清贫节俭的生活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的历史见证。

（摘自2019年第5期《档案时空》）

